

—— 2003 ~ 2013 ——

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 2003 ~ 2013 ——

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2003~2013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一系列重要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这十年来贵州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本书共分为四章,以时间为轴线,分别介绍了史前时期、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和魏晋至明清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

本书可供历史、考古、文物、博物馆工作者、高校师生等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2013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03-046342-5

I. ①2… II. ①贵… III. ①文物—考古发现—贵州省—2003~2013
IV. ①K87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0049号

责任编辑:柴丽丽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肖 兴 / 装帧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4

字数:450 000

定价:2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编辑委员会

顾 问：许 明

主 任：王红光

副 主 任：张 勇 周必素

编 委：王红光 张 勇 周必素 杨正权 张 元

曹 波 李 飞 张合荣 宋先世 吴璐珊

赵小帆 董 欣 胡昌国 张兴龙 吴小华

主 编：周必素

副 主 编：张 元 曹 波 李 飞

执行主编：吴小华

序

贵州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开展较早，至今已逾 60 年。1954 年，时值羊昌河水利工程建设，当时的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就派人配合工程建设开展过一次考古调查，并调派干部前往工程建设指挥部宣传文物保护。这种工作方式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初，文物部门是断断续续地针对一些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受多方面条件制约，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推进的力度总的来说是比较小的，部分文物在工程建设当中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贵州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应该说是始于 21 世纪初。当时正值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量建设工程如水电站、火电厂、高速公路、铁路、输变电、输油管线、水利工程以及房地产、工业园区等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给贵州的基本建设考古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走到今天，经过了一个艰难又欣慰的历程。

一是工作局面的艰辛开创和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虽然在以前的建设工程中有所涉及文物保护和田野考古的情况，但应该说都是应对性的，一般是在建设中有遇到文物的情况后，才通知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同消防员般奔赴现场扑火，实际上已经对文物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扑火般的工作已经不能满足文物保护的需要，于是，基本建设考古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这种新型工作，首先，是要求文物保护部门自身的理念创新，要求对传统工作思路、方式和方法进行转变；其次，是对项目的建设、管理、审批等部门反复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宣传。经过不懈的努力，文物保护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得到认同，贵州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二是深入地推动了贵州考古的发展。随着大量的抢救性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启动，使得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遗迹遗物被发现并被发掘

出来。由于建设工程具有点、线、面分布的特性，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也是按点、线、面铺开，通过逐年地积累，逐渐建立起了乌江、红水河、南北盘江、清水江、锦江等流域以及滇东黔西、黔中地区等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谱系。如，2003年为配合贵开（贵阳至开阳）二级公路建设调查发现并发掘的开阳哨上打儿窝遗址，将贵阳市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万年；2004～2011年为配合清水江梯级电站开发建设，经过数年的调查和发掘，于清水江流域揭露出自旧石器时代，历经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直至宋元明清时期各类遗存20余处，填补了黔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历史空白；2003～2008年，为配合乌江流域彭水电站开发建设，经过5年多持续不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不同时期的各类文物标本数千件。基本上厘清了乌江中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个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2005～2008年，为配合北盘江、红水河梯级电站的开发建设，我们相继在这一流域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获取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学材料，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流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同时还厘清了其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两广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通过这么多年来地不断努力，铢积寸累，一方面我们基本建立起了贵州乌江、清水江、北盘江、红水河等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基本梳理出了贵州几大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区域类型。

三是推动全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有效地扩大了贵州文化的影响力。全省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致力于文化强省的目标逐一开展，特别是在中共贵州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上通过《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见》后，我们的工作涉及历史和民族等各个领域。自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伊始，贵州有盘县大洞、赫章可乐、威宁中水、遵义海龙囤、遵义杨氏土司墓地等考古发掘项目相继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殊荣；在国家文物局2012年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贵州就有遵义海龙囤、万山汞矿遗址、苗族村寨和侗族村寨共4项列入（列入数量居全国第2位）；赫章可乐遗址列入国家100个大遗址名单，等等。一张张文化名片在考古工作的推动下落户贵州，切实增强了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的文化水平，不断树立贵州的文化品牌和特有的人文形象，有效地扩大了贵州文化的影响力。

四是及时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老少边穷、夜郎自大”一直是贵州给人的印象。其实不然，贵州不仅自然风光秀美、矿产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沉淀同样厚重。通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贵州省境内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14852处，其中有上千处都是在基本建设考古调查时发现的。由于及时制定科学有效的文物保护方案，抢救并保护了一大批文物。同时，随着基本建设考古的深入推进，文物保护的工作范围和内容也不断拓展。最初开展的基本建设考古，主要对象是地下文物如古遗址、

古墓葬、古窑址以及地面文物如古建筑等。

五是推进基本建设考古视域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贵州具有丰富的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传统村落及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关乎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的村寨调查到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到近年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多民族地区村寨文化建设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我们始终将村落文化遗产作为基本建设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实施全省文化遗产保护“百村计划”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如,2007年3月,在配合厦蓉高速贵州境水口(黔桂界)至都匀段(水口至格龙区间)建设时,把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也列入了基本建设考古的内容中。由于设计线路从肇兴、堂安、已伦、纪堂、登江、厦格几个村寨中穿过,势必会破坏这几个民族村寨的景观,于是提出了线路改线绕行的保护方案。最后方案得到了业主方——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的认可并实施,工程为此多投资近2亿元,几个村落文化景观的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护,是贵州基本建设考古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成功案例。

基本建设考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十年里,我们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建设,新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窑址、古碑刻、古建筑等各类历史文化遗产数千处,并对其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其中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是我们对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中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有效手段。通过考古工作,不仅使这些历经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免于建设性破坏,更让其发挥遗产价值,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实现了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基本建设考古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许多重量级的考古发现都是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取得的。同时,在工程上马动工之前先行开展考古工作,还上升到了法律上的规范和确认。今天,无论省内省外,可以说哪里有重要工程建设,哪里就有考古人的身影。进入21世纪这十年来,是贵州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也是贵州考古硕果累累的十年。

回顾60余年历程,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基本建设相关单位的重视、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在贵州文博考古界的努力下,贵州基本建设考古发展迅速,日臻成熟,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调查发现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千余处,考古发掘出土各类文物近万件,整理出版基本建设考古报告、简报数十篇,文物得以及时修缮和妥善处理,极大地促进了我省文博考古事业的发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这些年的重要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拣选汇编成册,是对这些年工作的一次系统梳理,更是一次对文化遗产保护及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及成果的宣传展示!

十年来,贵州的基本建设考古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我们仍需要不断地夯实

基础，明确今后工作的重点和目标，力争在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研究、史前文化的谱系建立、夜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土司考古、民族考古等诸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物质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和物质财富，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文物部门，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相信有贵州文博考古界同志们一如既往的努力和锐意进取，贵州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更好的成果。

是为序。

王红光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贵州基本建设考古的回顾与展望

基本建设考古简称基建考古,是指基本建设工程开工前所进行的考古活动,它是文物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与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主动性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不同,这是一项抢救性的文物保护工作。贵州的基建考古工作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历经风雨,至今已走过 60 年漫长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许多不足,对其进行回顾,有利于未来工作的开展。

一、贵州基建考古的历程

(一) 第一阶段:启动期(1954~1966 年)

1953 年年初,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次年更名为筹备处),即便在辖区内积极开展考古工作^①,这对贵州考古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1954 年,羊昌河水利灌溉工程启动,省博物馆筹备处在平坝县境内的羊昌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汉代遗存,贵州基建考古的序幕就此拉开。此后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 1956~1958 年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清理汉墓 28 座,获取各类珍贵文物 300 余件^②。不久之后在清镇、平坝交界处的尹关、琊陇坝等地调查发现各类墓葬 300 余座,清理了其中的 140 座,时代涵盖了汉至宋,该项工作可视为羊昌河流域基建考古的延伸^③。差不多与此同时,1956 年春,在配合川黔铁路修建所进行的考古调查中,于

① 1953 年秋调查发现杨桲墓。参见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杨桲墓发掘报告(初稿)》,1965 年 8 月油印本,第 35 页。

② 熊水富:《羊昌河灌溉工程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4 期;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贵州平坝金家大坪古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 年第 1 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1 期。

③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4 期。

桐梓县境内发现一批宋墓和崖墓,并对其中2座宋墓进行了清理^①。1960年,为配合猫跳河水利工程,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琊陇坝一带进行了历时数月的考古发掘,清理墓葬100多座,其中部分为宋墓^②。

可以看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水利工程、铁路大规模投入建设,基建考古也得以全面开展。难能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文物工作者还不忘保护理念的传播,如羊昌河水利工程推进的过程中,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就曾派员“前往工程指挥部配合进行宣传保护文物工作”^③。从某种意义上说,贵州考古是在基建考古背景下的黔中汉至宋代遗存与黔北宋墓调查、发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 第二阶段: 缓慢发展期 (1966 ~ 1990 年)

1966 ~ 1976年的“文革”十年,国民经济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其中1966 ~ 1972年,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后才缓慢恢复。在“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考古人激情勃发,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等一批战国秦汉时代遗存的发现和发掘,由于其与夜郎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这一时期的贵州考古以主动性的考古工作为主,基建考古开展不多。

这一时期开展的基建考古工作较重要的有清镇干河坝“石棺葬”墓地的发掘、黔西汉墓的清理等。1972年春,配合清镇洗涤剂厂建设,在干河坝清理“石棺葬”84座,系宋明时期的当地少数民族墓葬^④。同年,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在黔西清理汉墓10余座^⑤。1975年,配合乌江水电站的建设,对水淹区内修文、息烽、金沙等县的相关区域进行调查,在金沙县农民公社及后山、息烽县九桩区新阳公社发现新石器时代磨光石器及汉代古墓葬数座和画像石墓、火葬墓。1982年,对兴义天生桥水电站水淹区进行调查,在兴义巴结者安、波那等地征集青铜靴形钺等9件^⑥。1984年,在务川县城基建过程中发现汉代砖室墓^⑦。1989年,对乌江彭水电站淹没区进行调查,发现汉墓10余座,窑址5座,并对窑址进行了试掘^⑧,这是贵州首次发掘的汉代窑址。

① 熊水富:《贵州省最近发现的一些考古资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期;贵州省博物馆发掘组:《贵州桐梓宋墓的清理》,《考古》1958年第2期。

②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③ 熊水富:《羊昌河灌溉工程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贵州平坝金家大坪古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④ 何凤桐、李行垣:《贵州清镇干河坝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⑤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⑥ 刘恩元先生提供。

⑦ 程学忠、朱祥明:《务川县汉砖室墓清理简报》,《贵州文物》1986年第1期。

⑧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沿河洪渡汉代窑址试掘》,《考古》1993年第9期。

与 20 世纪 50 年代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及随之而来的如火如荼的基建考古工作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基建考古项目不多,重要发现也不多,处在缓慢的发展期。

(三) 第三阶段:步入正轨期(1990~2000 年)

1982 年 1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使基建考古进入有法可依的历史阶段。1990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等联合颁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建立起基建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预算依据。1995 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省博物馆独立。以上事件,在客观上促进了包括基建考古在内的贵州考古事业的发展。

1990 年,配合鸭池河流域东风水电站建设,对水淹区内的织金、黔西等县的相关区域进行调查。这是贵州基建考古历史上首次根据 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 90(248)号文件的相关精神,将文物保护工程“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对基建考古进行取费的项目^①。此后,1991 年,为配合乌江水电站修建,对黔西化屋基石板墓进行发掘。1992 年 10~12 月,配合南昆铁路建设,对沿线进行考古调查。1995 年,配合内昆铁路建设,对沿线进行考古调查。1996 年 9 月,在贵阳市晒田坝修建安居工程时发现并清理了 6 座明清墓葬,出土的 7 合墓志,是这批墓葬最重要的发现^②。1998 年 6 月,赤水市在修建截角至复兴公路时,在马鞍山南侧发现 21 座崖墓,随即对之进行抢救性清理^③。这一时期也曾配合乌江构皮滩水电站、红水河龙滩水电站等建设,对两个流域进行过调查,但未有重要发现。

取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建考古工作的发展,标志着贵州基建考古逐步步入正轨。

(四) 第四阶段:高速发展期(2000 年至今)

2000 年 3 月,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加速了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2002 年 10 月,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在基建考古取费的表述上,从 1991 年“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调整为 2002 年“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这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基建考古经费的具体来源。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西电东送”项目的实施,贵

① 刘思元先生提供。

②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阳市文物管理所:《贵阳市晒田坝基建工地明清墓葬清理简报》,《贵州文物工作》2006 年第 4 期。

③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水市文物管理所:《贵州赤水市复兴马鞍山崖墓》,《考古》2005 年第 9 期。

州洪家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彭水电站、清水江流域梯级水电站等工程启动。铁路、公路建设亦进入新阶段。贵州基建考古随之积极开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2002 年春，配合渝怀铁路建设，对贵州段进行调查，进一步确认了铜仁锦江流域的漾头、岩董等遗址。此后的三普期间又有了新的发现，目前该流域商周至汉代遗存已达 20 处。同年秋，为配合金阳新区建设，贵州省博物馆组成史前考古调查队，对该区域的洞穴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发现史前洞穴遗址 16 处，采集石制品及陶器残件 1000 余件^①。2003 年冬，配合彭水电站建设，对乌江下游地区进行调查，发现一批新石器、商周、汉代及宋明时期遗存，并于 2005～2008 年对其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2004 年夏，配合托口、白市等梯级水电站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水江流域展开调查，发现一批史前、战国秦汉和宋元明时期遗存。2009～2011 年，会同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初步厘清了该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商周至战国秦汉及宋元明时期的文化发展脉络^②。2005 年 3～5 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红水河流域的龙滩水电站淹没区进行补充性调查，对红水河北支北盘江流域的董箐水电站淹没区进行调查，发现一批阶地遗址，于 2005 年 10 月～2009 年 1 月数次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确认其分属新石器、商周、汉晋、宋明等不同时期^③。

这一时期针对高铁、高速公路、电站（水电、火电）和工业园区所开展的基建考古取得了重要收获，如长昆高速、油气管道、夹岩水库、高坪工业园区等的考古调查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该期的基建考古项目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此间每年开展的基建考古项目在 50 项左右，无论深度、广度，抑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社会影响均超越以往，贵州基建考古步入高速发展期。贵州基建考古 60 年的历程，与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贵州基建考古的收获

以上粗略回顾了贵州基建考古的历程，下面对贵州基建考古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从范围的拓展、学术成果等几方面展开。

① 贵阳市金阳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贵州省博物馆：《金阳史前文化探秘》，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② 清水江考古队：《贵州清水江流域再次大规模发掘初步厘清文化发展脉络》，《中国文物报》2010 年 5 月 20 日第 4 版。

③ 杨洪：《贵州北盘江流域先秦时期遗存分期与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2 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董箐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 年。

（一）基建考古领域的不断拓展

这里所指的领域，是就基本建设项目的类别而言。

贵州基建考古的范围从早期的农田水利工程、水电站、铁路不断拓展，眼下已经涵盖铁路，公路，机场，水电站，火电站，输变电站，水库，石油、天然气站场与输管道，工业园区，城市新区等建设领域。具体而言，配合基本建设实施的考古项目涵盖了贵州大小河流上面建设的大、中型水库，水电站，水利灌溉工程，以煤为能源的煤化工基地，火电厂，风力发电厂，国家电网输变电路及其设施，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管道，不同等级的公路、铁路，国家和地区开发的新区、工业园区及大型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和城镇建设，等等。贵州考古工作在国家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占有的重要地位从中可见一斑。

基建考古领域的变化，首先是新中国建设领域不断拓展的结果；其次与贵州考古人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因为时至今日，也并非所有基建领域都能有效开展考古工作。此过程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大致可以2003年为界，此前的基建考古多是政策规定必须开展该专项而由建设方主动找上门来的项目，主要是国家层面立项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2003年以后，贵州考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精神主动出击，与发改、交通、电力、移民等多部门互动，逐步打开工作局面，项目的涵盖面向省、市、县等不同层面拓展。在积极保障基本建设的同时，也使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

（二）学术成果

60年来，贵州基建考古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是显著的，本书所收的主要就是这方面的成果。概括起来，早期主要是一些点的积累，后期随基本建设面的拓展，考古工作在线和面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也有了对基建考古工作的学理思考。

1. 点的积累

许多基建考古成果，因为工作面的限制，主要反映在一些个别点的发现上，但日积月累，可以形成对一个地区完整的印象。撮其要者缕述如下。

1954年，羊昌河水利灌溉工程开始动工修建，贵州省博物馆派出考古工作人员组成清理发掘组奔赴工地现场，进行文物保护的宣传、文物考古调查、出土文物的清理、施工影响范围内古代墓葬的发掘等。在清镇、平坝一带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多处，发掘清理两汉至宋明时期的古墓上百座，出土了釉陶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木器、石器、玛瑙器、琥珀器、琉璃器、漆器、印章及古钱币等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的釉陶珠、釉陶水注、铜铎斗、铜壶、铜瓶、铜戈、铜豆、铜盘、铜洗、铜釜、铜镜、铜灯、铜耳杯、

铁剑、铁剪、金钗、银钗、木剑、石砚、五铢钱、货泉钱、大泉五十钱、“谢买”印、“樊千万”印、“赵千万”印等在贵州是首次发现，由此揭开了贵州地下文物的金山一角，极大地丰富了贵州省的出土文物藏品。

1956年，为配合川黔铁路的建设，考古工作人员在桐梓县发现了一批宋代墓葬，并于同年4月在夜郎乡和元田坝各清理了宋代双冢石室墓1座，出土铜壶、陶碟、陶杯、酱釉双耳小陶罐、白釉瓷碗、豆绿釉荷瓣瓷碟、瓷盘、金耳杯、银饰、“崇宁通宝”钱等文物。其开启了黔北宋墓发掘的先河，为紧随其后以播州土司杨粲墓为代表的宋代石室墓的考古发掘积累了前期的工作经验。

2003年8月，为配合贵开路建设调查发现的开阳哨上打儿窝史前文化遗址，是黔中地区首次发现并进行科学发掘的早期文化遗存。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当年9~11月就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随后又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协作进行了几度发掘。发现大量的兽骨、烧骨和人类用火遗迹等，表明这里是一处史前人类的居住活动遗址。遗址中大型骨器的使用，应该与挖掘植物的块根有关。大量的兽骨，表明肉食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兼以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和块根。出土的动物牙齿以鹿和牛最多，说明猎取的对象以此为主。

2004年年初，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大花水水电站施工区及库区进行考古调查时，于开阳县高寨乡发现岩洞葬4处，分别为平寨村么罗寨洞、围坡田1号洞、观音洞、仓口洞。同年5~6月，对这4处岩洞葬进行了清理。根据伴出的钱币，大致推测这些岩洞葬的年代应为宋明时期。

自1972年3月以来，黔西县林泉区野坝、罗布垮，甘棠乡高坡、熊坡、朝阳大队，绿化乡大海子等地共清理汉墓27座，出土各类遗物数百件。2005年5~6月，为配合黔西火电厂施工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黔西火电厂建设区域内的汉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汉墓10座。发掘出土遗物120余件，其中陶器完整或可复原者50余件，器形有瓮、罐、釜、豆、灯、甗、钵、俑、模型等。铁器共19件，有釜、刀、锄、削、锯、钎等。铜器有釜、釜、碗、铺首、泡钉、带钩、夹子、顶针、珠、摇钱树残片和镜等。钱币有货泉、五铢钱等321枚。另有银器、琉璃器、石器和琥珀器等26件。

2007年7月中旬，习水至桐梓新站的二级公路施工过程中，在桐梓县夜郎镇茶台村岩伦组一带发现一批宋墓，8~9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桐梓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共清理墓葬8座，其中岩伦3座、杨八5座。墓葬的年代初步推断应在南宋中晚期。黔北是贵州宋墓的主要分布区，此次发掘的8座宋墓，是贵州近年来对黔北宋墓所开展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科学清理工作，发掘所获资料对研究黔北地区宋代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川黔地区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2004年7月，为配合石垭子水电站的修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站水淹区

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江边一带又新发现汉代遗址 2 处，并对其中 1 处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出土卷云纹瓦当等遗物。2007～2010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务川县文物管理所对江边一带的汉墓群先后展开两次大规模发掘，共计清理墓葬 47 座、汉代窑址 2 座，获各类遗物 500 余件（套）。其中 24 座汉墓出土有朱砂，这是大坪汉墓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2009 年年初，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晴兴高速公路建设用地区进行考古钻探时，在兴义市万屯镇阿红村发现 1 处古代文化遗存。通过发掘确认遗址年代最早可到春秋战国，晚可至汉代。2010 年 10 月，在晴兴高速公路文物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阿红遗址汉代土著居民的墓地——老坟山墓地和新寨墓地。经过 50 余天的发掘，共发掘墓葬 60 座，老坟山墓地 57 座，新寨墓地 3 座。老坟山墓地墓葬随葬有大量玉石饰品。对墓地出土人骨的鉴定表明，“无论男女性，四肢骨的发育普遍较细弱，肌腱发育不明显，可能生前不常从事较重的劳作”。墓群中使用牛、猪、狗等家畜陪葬，在此地区同时期汉式墓中是不见的。根据这些因素，推断老坟山石板墓的主人当是土著民族，年代不晚于东汉中期。

2. 线的延伸

配合乌江、红水河、赤水河、清水江、锦江等流域的基本建设所开展的考古工作，线性地梳理了几大流域的文化面貌及其发展脉络。可以说，这是贵州基建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详述如下。

（1）乌江流域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乌江干流上建设的乌江渡水电站，直到近年建设投产的沙沱水电站，乌江流域贵州境内已建成普定电站、引子渡电站、洪家渡电站、东风电站、索风营电站、乌江渡电站、构皮滩电站、思林电站、沙沱电站、彭水电站（贵州与重庆相交）10 个大型梯级水电建设。在东风电站、思林电站、彭水电站等库区淹没范围内，发现众多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古代墓葬以及古建筑、古遗址，并抢在电站下闸蓄水之前对项目涉及的文物考古工作内容及时地进行了抢救性的野外发掘清理。

地处乌江上游鸭甸河与鸭池河汇流处，清镇、黔西和织金三县交界河谷地带的东风水电站化屋基苗寨，在电站建设之前的文物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少数民族石板墓，后清理发掘了上百座。

在彭水水电站库区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数量众多、内涵丰富，既有古遗址、古墓葬，还有古窑址等。其中的淇滩小河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于 2003 年调查发现，2005 年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发掘。其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各类石制品、断石、石料、动物牙齿化石、陶片等共计 170 件。采集石制品、陶片等标本 19 件。同样称为小河口的还有处于乌江和小河交汇处南面一级台地上的坝上小河口遗

址,隶属沿河县和平镇复兴村坝上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分别于2006年11月、2008年4月、2008年9月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了商周和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商周文化遗存的发现最为重要,其地层出土器物与成都十二桥文化出土器物近似,应属于巴蜀文化在贵州境内传播的重要地点,也是乌江流域目前发现、发掘的巴蜀文化在贵州境内分布的最远地点。

沿河县黑獭乡虎头村以北乌江南岸的神坝渡遗址于2003年在配合彭水水电站工程建设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以黑獭遗址群面积最大,共包括黑獭堡、大河嘴、李家坪、木甲岭、神坝渡5处紧密相连的古遗址。2006年6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的神坝渡遗址进行了初次试掘,2006年12月~2007年1月,进行系统发掘,两次发掘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发现神坝渡遗址主体堆积与其临近的大河嘴、李家坪、黑獭堡等遗址无论是地层堆积情况,还是出土遗物的文化特征方面都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址的出土物与重庆酉阳清泉邹家坝、涪陵涪溪口、忠县哨棚嘴、万州苏和坪等峡江地区遗址的出土物也有较多的一致性。其主体时代当为商周时期,与峡江地区的巴蜀文化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峡江地区古文化沿乌江向黔东南地区发展的态势。

相邻的李家坪遗址行政隶属沿河县黑獭乡大溪村李家坪组,位于乌江南岸的一级台地上,从发掘的情况分析,李家坪遗址似为遗址的墓葬区,发掘的6座商周时期墓葬,为研究商周时期这一地区的葬制、葬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为这一地区的文化划分提供了新的依据。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显现出与蜀文化的极大相似性,为研究商周时期乌江流域的文化传播以及文化属性提供了新的依据。

2006年4~7月,对大河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发掘出汉代房址1座、灰坑2个,商周时期房址4座、窑2座、灰坑3个、沟1条以及大量柱洞等遗迹。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铜器和少量铁器。大河嘴遗址以西约1公里处的木甲岭遗址,其文化性质与大河嘴遗址一致。通过对上述两个遗址的发掘,基本了解了乌江下游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为研究这一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配合彭水水电站工程建设过程中,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8年、1995年、2003年和2005年先后数次对洪渡镇库区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和复查,在洪渡镇镇政府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中锥堡遗址、丰产坝汉窑址、汉墓群和大量宋明时期墓葬,并于2005~2008年先后数次对水淹区内的文物遗存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其中中锥堡遗址是所有已发现遗址中地层堆积最厚、层位关系最清楚、出土遗物最丰富的遗址,是贵州乌江流域考古的重要收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贵州东北部考古工作的空白,不仅是探讨乌江流域古代文化发展

早晚序列建立地层学的依据,更为其他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提供了参照。洪渡周边的汉代遗存在探讨汉文化进入贵州的路线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除墓葬以外,在洪渡镇丰产坝库区还分布有汉代砖瓦窑遗址。2005年冬,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该窑址群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根据在本地发现的汉墓材料,这些窑址中出土的花纹砖应是专门为营建墓葬而生产的。

乌江上游的基建考古成果,可以六枝老坡底为代表。2005年5月,配合六枝老坡底水电站工程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电站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和钻探,发现蔡家坟、青岗林、夏大田、台子田、丫口地、对门坡、包包寨和罗家寨8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面积均在1万~3万平方米。通过对其中的蔡家坟、台子田、夏大田和青岗林4处遗址进行的重点钻探和第一阶段抢救性发掘,发现大量遗迹现象,出土部分文化遗物。老坡底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贵州近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2) 红水河流域

位于珠江水系之上的红水河龙滩水电站,是贵州境内的一大国家重点项目。为配合龙滩水电站建设,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5年和2005~2006年前后历时20年,对龙滩水电站贵州境内库区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发现史前至秦汉时期古代遗存12处,并对其中的孔明坟遗址、天生桥遗址、沙坝遗址、拉它遗址、水打田遗址、浪更燃山石板墓群等进行了考古发掘。

孔明坟遗址位于贞丰县鲁容乡孔明村附近的孔明河与北盘江汇合处的北盘江东岸一级阶地之上,遗址分布面积近万平方米。2007年3~8月和2008年10月~2009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贞丰县文物管理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获知该遗址是北盘江流域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其文化遗存以新石器时代为主。遗址中发现的与石器制作相关的遗迹十分丰富,是目前贵州省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

同期发现的还有贞丰县白层镇兴龙村的天生桥遗址。2005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生桥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了一批玉石器和大量陶片。2008年3~6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生桥遗址正式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发现天生桥遗址与普安铜鼓山遗址、白层坡们遗址存在可比较性,遗址的发掘为北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沙坝遗址位于贞丰县鲁容乡鲁容村沙坝组,处于北盘江东岸的一级阶地上,沙坝河与北盘江的交汇处,遗址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大部分处于龙滩水电站水淹区。2008年3~5月和2008年10月~2009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掘队伍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并伴出许多石器加工工具,显